

业茶、兴瓷与从教:近代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考论^{〔*〕}

康健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徽州茶商李训典出身于商贾世家,精于茶叶制作,多次代表徽州参加国内外的博览会,为徽州名茶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在近代转型时期,李训典家族将商业经营、实业救国理念和从事基层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徽州茶商家族的这种文化自觉既是徽商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超越,更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思潮不断涌现的近代社会剧变背景下,徽商以自身方式所展现的浓厚爱国情怀与时代担当。

[关键词]近代;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茶叶经营;振兴瓷业;基层教育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7.015

晚清时期,徽州茶商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努力抓住世界茶叶市场发展新趋势,借助以博览会为代表的近代物质交流新窗口推广优质新产品,^{〔1〕}从而赢得商机与利润,成为推动近代徽商群体发展转型的支柱性力量。近代徽州茶商家族在获利并显赫的同时,其子弟大多陆续投身其他行业,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在承续明清传统徽商发展路径的同时也体现出近代社会的典型时代特征。以往学界对徽州茶商家族与近代世界博览会事业之关系、茶商家族多元化发展路径及其时代特色等问题缺少具体考察。^{〔2〕}有鉴于此,笔者以近代徽州著名茶商李训典家族为例,利用族谱、报刊和民间文书等资料,对李训典家族的茶叶经营、家族子弟振兴瓷业与投身新式

教育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从不同侧面呈现徽州茶商家族发展与近代社会剧变之复杂关系。

一、茶叶经营

李训典家族世居祁门南乡景石村,属于祁门景石李氏。从大的支派来说,其宗族属于三田李氏中的界田派。^{〔3〕}李训典高祖父为30世钟兴公,因族谱残缺,其生平事迹无从知晓。钟兴公生志祥和志裡两公,后者承钟雷公祧。曾祖志祥公(1789—1869),官名延裕,字德昭,号简轩,国学生。幼习儒业,屡试未售,加之因家事繁多,遂弃儒治家。他重视家族子弟教育,以朱子《家礼》为治家范本,热心宗族事务,“更新祠宇,创立启采公祀业”,^{〔4〕}为家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志

作者简介:康健,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茶叶贸易史和徽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徽州茶商研究(1500—1949)”(22BZS160)的阶段性成果。

祥生有二子：联璉、联芳。联璉（1808—1862）为李训典祖父，官名文煌，字和璧，号玉斋，例贡生。联璉开启家族经商传统，同时热衷于宗族事务，积极维持族约，为亲族排难解纷，办事秉公执正，在乡里很有声望。联璉去世后，其妻胡氏继承崇文重教的传统，“择地陈家山，建立挹元书屋”，教诲儿孙，成就斐然。其八十寿时，翰林院庶吉士婺源宗昭炜和当涂县训导、祁门汪村的汪光烈均撰有骈散寿序。九十寿时，安徽督学部院钱某题有“北春堂永”四字额，邻村严潭岁贡生王殿臣撰有寿序。^[5]李训典叔祖联芳生教诚、教灼和教育三子。其中，李教育继承家族经商传统，并“精于茶务，深得陆庐之秘，善于治生，广置田园，工于营谋，建造华屋，羡慕书香，教子成名”，^[6]不仅经营贸易较为成功，而且教子有方。

训典祖父联璉生二子：教道、教理。训典伯父教道（1834—1886），字宗圣，一字丽生，号华山。教道生训诰、训则和训常（幼殇）三子。训典之父教理（1840—1902），官名登鳌，字仰贤，号衡山，增贡生。教理生七子：训谟、训典、训伦、训英、训维、训正、训吉。其中仅有训谟、训典和训英长大成人，其他均殇亡。训典（1865—1931），字旭寅，号徽五，附贡生。娶贵溪十甲胡氏名秀，生四子：家驥、家駟、家馿、家騑。^[7]训典自幼有大志，“习举子业，年甫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自是朝乾夕惕，益求上进”，^[8]后因生计问题，被迫从商。李训典曾先后充任安徽巡按使公署、巴拿马博览会筹备会劝导、徽属红绿茶出品专员、祁门县茶商公会会长，^[9]是其家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不仅推进其家族的商业发展走向鼎盛，对徽州茶业与茶商之整体发展亦功不可没。

教道、教理一同打理家庭的茶叶生意。但因教道中年去世，当时“家中茶业生理正盛，助理需人”，训典的堂兄训诰（即教道长子）又受聘到外地担任塾师，训典两弟训英、训则尚幼。在这种境况下，家中缺少茶叶贸易的人手，于是训典遵守“有事弟子服其劳之训”的族规家训，“舍学就商”，佐助父亲和兄长训谟一起“经营德隆安茶

号、鼎和红茶号”，^[10]从此走上茶叶经营之路。李训典长子家驥（1892—？），字越凡，号攀月，别号饮雪嚼冰者。毕业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后为增生，先后在南京茶务讲习所和皖江法律学校进修，学有所成后帮衬其父经营茶叶。^[11]

李训典家族从事安茶和红茶两种茶叶贸易，在长期的经营中互有盈亏。关于安茶，民国《祁门之茶业》记载，“红茶之外，尚有少数安茶之制造，此茶则概销于两广，以制法与六安茶相仿佛，故名为安茶。严格比较，则稍觉粗放。如其南乡孙义顺之出品，有百余年之历史，在粤东颇负盛名，与‘徽六名茶’并驾齐驱。岭南医士诊方，常有以孙义顺茶叶为引者，亦可见其珍贵与价值也”。^[12]民国著名学者洪素野到皖南旅行时也谈及祁门安茶：“红茶以外，尚有少数仿六安茶制法，名为‘安茶’的，在两广一带负盛名，产于南乡。”^[13]由此可见，安茶主要以祁门南乡出产最为著名。李训典就是祁门南乡景石人，其家族从事安茶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李训典开始接管家中的茶叶生意之时，安茶贸易“胜算常操”，但因家中人口众多，房屋不够居住，于是李训典的父亲李教理准备添建新居，但很快茶叶贸易遭受巨大挫折，“光绪五年红、安两茶，均遭亏折，继开景隆茶号又蒙钜创，元气因此大伤”。^[14]这次茶叶贸易的损失，使得李训典家族的茶叶生意元气大伤。但李训典并未灰心，而是秉承徽商创业“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15]的“徽骆驼”精神，继续经营茶叶贸易。光绪十四年（1888），他在南乡奇口村开设德和隆茶号，终于“稍获赢余”，家族的商业贸易开始有所转机。

光绪十七年（1891），李训典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建造新房，花费甚大，新居落成之时，已背负一定债务。此后的茶叶贸易时好时坏，造成“前偿未清，新债又起，继长增高”，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李训典长期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训典协助父亲经理三公祠，建造享祠，并利用祠堂租设鼎和茶号，兼营杂

货、药材生意。当时其兄长训谟去世、父亲又双目失明,加之,当年红茶行情虽然尚好,但安茶却严重滞销,造成生意亏折,致使“家计债务,丛集一身,其困窘宴,难以言状”。^[16]此后,李训典的红茶生意一蹶不振,债台高筑,终身受累。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训典又遭丧父之痛,从此家庭负担落在他一人身上,苦苦支撑茶叶贸易。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训典母亲去世,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对茶叶生意不免灰心,转而潜心研究《茶经》,探寻优良的制茶之法,力求精益求精,出产的红茶“制法之善,出品之良,久已脍炙人口”。^[17]

作为徽州茶商巨擘,李训典先后多次作为徽州茶叶专员参加博览会,藉机推动徽茶迈向国际市场。族谱中历数其任职和获奖情况如下:

训典,附贡生。乳名新贵,字旭寅,号徽五……。曾充安徽巡按使公署、巴拿马博览会筹备会劝导、徽属红绿茶出品专员、祁门县茶商公会会长,迭获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头等奖凭、奖图、商标等,华茶推销美国自此始。^[18]

从上引内容来看,李训典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商人,而且具有社会担当精神,带领祁门红茶走向世界,赢得国际声誉。

因李训典在祁门红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宣统二年(1910),他被“安徽实业厅委为办理南洋劝业会祁门茶叶出品专员,亲赴南京与会”。南洋劝业会设奏奖(一等奖)66名,茶业共获得8名一等奖,其中徽州茶商在上海开设的洪昌隆茶栈出品的祁门乌龙茶、天保祥茶栈出品的祁门贡尖茶名列一等奖。^[19]李训典生产的两款红茶、康达(字特章)出品的一款红茶、胡啸琴出产的一款红茶和胡元龙出品的一款仙茗茶均获得银牌奖。^[20]在南洋劝业会中,祁门红茶“博取一等褒奖,祁红声价因此日高”。^[21]李训典作为祁门茶业专员参加南洋劝业会可谓不辱使命,为祁门红茶赢得了巨大国际声誉。除了红茶外,由李训典挑选出来的祁门南乡康伊侨、康绍文、康景倡出

品的安茶也获得银牌奖。^[22]

迨至民国,李训典又被安徽实业厅委任为办理巴拿马赛会^[23]徽属茶叶出品专员,负责组织挑选徽州红茶、绿茶参加本次博览会。李训典曾在安徽巡按使公署任职,他精挑细选出毛尖、安茶二百件,并向该公署申请载运茶叶的船只减税获得批准,顺利将这些茶叶运美参赛。^[24]为了参会茶叶在会后能顺利出售,李训典以安徽出品协会的名义向安徽巡按使公署呈请,在巴拿马赛会结束后,由农商部改组中国茶行,专门代中国茶商出售各种名茶,并附设中国茶楼以卖茶营业,其资金由“农商部裁拨,或在出茶省份酌提茶税”。安徽巡按使公署和农商部最终同意李训典的提议,同意闭会后改组中国茶行,并设茶楼,具体事务由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负责。^[25]李训典此举为参展的华茶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华茶的国际影响力。

李训典以数十年的从商经验,挑选出的徽州红、绿茶大多数“博得优等金质奖牌”。^[26]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商品获得大丰收,“祁门红茶”以整体身份获得最高奖章“大奖章”一枚,祁门商人出品各种牌号的祁门红茶获得金奖多枚,其中就有西乡桃源的忠信昌茶号、南乡平里程村碣茶商胡云霞的春馨茶号、胡元龙的日顺茶号等。^[27]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使祁门红茶誉满天下。

民国五年(1916),李训典又被委任为意大利都郎博览会徽属茶叶出品专员,再次负责组织徽州各地茶叶参展。在这次博览会中,“我邑(祁门)之红茶、休婺之绿茶与赛者,均得优等奖凭”,“自是徽茶名誉,洋溢环球”。^[28]

李训典在担任祁门茶商公会会长期间,积极为茶商群体的利益奔走,突出表现在据理交涉姑塘捐税局强征茶税一事。1925年4月27日,祁门茶商乾大等商号将箱茶运经江西姑塘境内,被当地捐税局强行加征二成茶税,茶商恐耽误售茶时机,被迫缴纳此税,才得以顺利通行。祁门茶商回程后向李训典反映此事,于是李训典以祁门

茶商公会的名义向安徽省省长吴炳湘提出诉求，要求省政府“电咨赣省省长，飭令取消并将已收二成税款按票退还，不得仍由该省军阀勒令重征以重皖商担负”。其实，民国伊始，皖赣两省就曾多次达成“议定皖茶皖征，赣茶赣征，两不侵涉”的共识，姑塘捐税局加强茶税的行径显然有悖于此。李训典据理力争，经过多方协商，最后终于迫使江西省政府作出让步，要求姑塘捐税局“如遇皖省出洋箱茶经过，查验货照相符，立即放行，不得再收二成附加税。其已收之款，均经提填票报解，应请免于发还”，^[29]有力地维护了徽州茶商的合法利益，李训典也赢得茶商高度赞扬。

总而言之，李训典一生的安茶、红茶贸易大起大落，步履维艰，但他以丰富的茶叶经营经验和高深的造诣，先后担任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和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的专员，负责组织徽州红、绿茶参展，屡获佳绩，为徽州茶叶尤其是祁门红茶享誉世界作出巨大贡献。“半生苦心孤诣，得此佳果，利虽未就，志稍申矣”，^[30]算是李训典为茶业而奋斗的切实评价。

二、振兴瓷业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不少爱国志士热忱于倡导实业救国，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以此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1919年，包括李训典家族成员在内的祁门南乡学界人士组织实业教育研究社，认为“余等皆国民分子，救国义务宜各自尽其天职。今余等有愧于国势之不振，思救国必以实业为前提，以教育为归宿”，^[31]力争实业救国。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成员积极兴办瓷业公司，并提出很有见地的经济理念。

众所周知，景德镇在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瓷器制造业的重镇。瓷器制造的重要原料是高岭土，而景德镇瓷器制造所需的高岭土很大部分就来自与其毗邻的祁门县。据梁森泰先生的研究，晚明祁门就向景德镇供应瓷土。^[32]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举办徽州物产会的公文中就指出：

“伏思徽州为皖南望郡，图书之富，甲于东南，天产之饶，数难更仆。……如祁门之磁土，岁可供全国陶业之用。”^[33]这里也自然包括祁门继续向景德镇供应瓷土。

祁门的瓷土具有色白质细、性极赋密的特点，尤以东乡的庄岭脚、上下陈、吴坑口、龙凤壁、大北港等为优。^[34]明清时期，祁门“土瘠民贫，岁入无几，多取给于水碓、磁土”，^[35]可见经营瓷土成为民众生活得以维系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传统的瓷器外销受到西方严重冲击，以祁门籍著名实业家康达为首的爱国商人倡议改良瓷器制作，创建江西瓷业公司，为实现中国瓷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6]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下，光绪末年，江宁人娄国华向清廷提议创设祁门县瓷土公司，由藩库出资3万两白银，建设房屋，购买机器制瓷。但因制法不精，产品销路不佳，造成公司亏损严重，很快停办。在民国以后，安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下令对祁门瓷土公司以前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搜集该公司的档案卷宗，力图改良祁门瓷土生产制造。^[37]

李训典堂侄李家骧在基于历史传统和地方现实经济危机下思索实业救国之路，系统提出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新理念。李家骧（1884—1930），清邑庠生，字蛰凡，号竹舫，为李训典堂兄李训诰次子。他出身商人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预科，优贡本科第一类甲等。1918年，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的李家骧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实地考察，在向安徽省政府呈请的《创办祁门瓷业意见书》中系统阐述其振兴瓷业的理念。

在该文中，李家骧开宗明义地提出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内容如下：

富民之道，首在振兴实业。实业之兴，贵于因地制宜，艺谷于山，共知不获，缘木求鱼，其何能得。此孔子所以有因利而利之说也。吾皖土沃物丰，林矿丝茶，美利所在，成效昭彰，独工艺品少著名者。兹有一种天然美利之工业蕴藏埋没，从未经人道及者。其业维

何,瓷业是也。江西景德镇僻处内地,交通梗阻,所以昔时能为四大镇之一,至今犹不失为江西内地唯一之市场者,无非以瓷业之本,而其他各业,皆由瓷业因缘而生。吾皖祁门县毗连景德镇,瓷业原料亦产祁门,然但知卖原料,获蝇头微利,坐视景德镇之富庶,而不知奋然兴起,殊堪洁叹。鄙人宅处祁门,居邻景镇,谨就平时考察所及,研研所得,用特分条缕,述一贡其愚。^[38]

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李家骧认为振兴实业乃富民之前提,而祁门的瓷土是景德镇瓷器制造的绝佳原料,但长期未能在祁门当地实现充分利用。随后,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实地考察提出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具体方案。

李家骧立足祁门瓷土资源丰富的固有优势,以及与浮梁县、星子县和景德镇等邻近地区进行切实对比并概括总结的基础上,从瓷料精美、燃料丰富、原料低廉、销场便利、资本易筹和人才易得六个方面,系统阐述创办瓷业公司的设想。他认为在祁门创办瓷业公司并非首创,而是接续前人事业的“中兴之举”,颇有见地。针对有些人认为祁门附近的景德镇瓷业制造历史悠久,闻名海内外,会对祁门瓷业造成重大影响的疑虑,李家骧提出:“至于毗连景镇,不但不能为我阻力,且为他山之助。彼数百年之经验,我可以仿而行之;彼造成之人才,我可以选而用之。故密迩景镇,正可事半功倍,但能出货优良,何至受其迫压,而致遭失败。萍乡、醴陵瓷业,近已蒸蒸日上,渐有超过景镇瓷之势,可为明证。”^[39]用事实说明完全不用顾虑景德镇瓷器产销的“压迫感”,相反能扬长避短,互相借鉴,以此来推动祁门瓷业的发展。

在撰写意见书之后,李家骧向安徽省实业厅递呈创办祁门瓷业公司的条例、章程、资本筹集和公司内部组织大纲等具体计划,得到安徽省实业厅和省政府的认可。该公司章程分为资本之计划、进行之筹备和内部组织大纲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又由若干部分组成,内容十分完备。^[40]

在资本方面,李家骧提出公司资本拟为10 000元,其中优先股定为5 000元,以1 500元为购置建筑设备之本,其他资本则作为制造营业之用。他认为若能以此进行生产营业的话,虽然谈不上资本雄厚,但正常运作则游刃有余。在建造方面共需11 840元。在场址的选择方面,李家骧认为购买场地花费太大,只需租用厂址即可,地租为200元左右。厂内设办事处、客厅、陈列所、贩卖处各一所,烧成窑、试验窑、石膏窑各一座,锦窑三所,窑屋二所,厨房二所。在置备方面共需3 160元。设有办事处器具用品、客厅器具用品、材料室器具用品、坯房各项置备、机械辘轳十幅、烧窑用具、邮电并杂费等22个类别。

在筹备方面,李家骧提出公司资本分官商两部分来源,前者仰仗省政府拨款,后者则向资本家招股集资。为保障经费来源,他建议在教育经费下每年拨款若干元,创办瓷业职工养成所,目的是消除景德镇瓷业中不良习惯,并每年派遣具有瓷业知识的人士和中学生三四人到日本瓷业产地留学,学习研究成瓷烧成和绘画新法。他坚信如此三五年后,经过改良的瓷器成品必能有广阔的销场。他认为安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并不在于皖人实业观念薄弱和皖省物力贫瘠,而是此前兴办实业的实践中缺乏信用,造成资本家有所顾虑,畏首畏尾,不愿意出资。他立足祁门瓷土资源的优势,提出“兹之创办瓷业,乃利用当地天然特有之原料,而经营普通适用之制造,获利既速且大,又有确实之把握。决非茫无依据,绵远莫期者之所可比拟,且资本不甚巨大,易于招集。设备亦较简单,易于开办,不至有中止迟缓之失,足以担保其信用”,以此来打消资本家的忧虑,鼓励他们入股投资。

在公司内部组织方面,李家骧认为应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办事人,系专就制造处本店计划;乙组工人系根据烧成窑一座支配;丙组夫役之组”。具体来说,办事人之部若干人,分别由董事、检察人、总经理、副经理、总会计、副会计、总技师、副技师、售瓷、庶务、书记等组成。工

人之部共 196 人，分别由淘土、拉坯、利坯、上釉、装坯、造模、造坯、利坯、下釉、铸坯、碾料、青画、彩书、烧炉、大器匣、小器匣、烧窑总管、烧工、运柴、杂工、选瓷、磨瓷和菱草等组成。杂役之部共 29 人，分别为夫役 20 人、守门 2 人、茶房 3 人、厨役 4 人。此外，李家骧还对瓷业公司的生产制造情况、年销售量和售价收入等进行估算。按照他的估算，瓷业公司每月可烧窑 4 次，每年可烧窑 50 次。每次生产的瓷器分为白胎瓷和上色的彩瓷，以每次 1400 元的平均价计算，每年出产瓷品价值为 7 万元。他认为瓷业公司每年销售 2 万元的产品就能保本，高出此数则可获利，售出越多，获利越厚。

安徽省实业厅和安徽省政府经过研究，认为祁门以前仅为景德镇提供制瓷原料，如果自行生产瓷器的话，就能为安徽经济发开展辟新的利源。于是，安徽省公署赞同李家骧的建议，并下达批文“据陈意见尚属核实，所拟公司章程亦多可采，具见研究瓷业，殊堪嘉许。该生果能集股试验，官厅必乐于维持。若请由公家先行垫款，应俟财力充裕时，再行核夺可也”。盛赞李家骧此举，鼓励李家骧集资兴办，待省府经费宽裕时再给予支持。

虽然因资料缺乏，李家骧提议创建的祁门瓷业公司后续情况缺少记载，然从上述内容能清晰地看出，李家骧具有强烈的振兴实业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先进理念，同时又立足于详细调查和综合评估。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官府多少受到李家骧建议的影响，并采取维护祁门瓷土产销的行动。1922 年，祁门瓷土运销量比以往增加一倍，其中一半左右运销景德镇，其他瓷土则由祁门商人章信记等人自行推广销路。^[41]面对这样的形势，景德镇瓷商却想垄断瓷土市场，勒索祁门商人，遂使祁门商人向安徽省政府禀告此事。于是，当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与江西省政府协商，要求景德镇瓷商自行整顿，摒除积弊，将运销的祁门瓷土制定公允的标准，以此维持瓷业。^[42]1923 年，上

海总商会给安徽吕省长发函称，景德镇瓷业公司禁止祁门瓷土外运到上海益中机器公司，造成该公司无法配置电气瓷料，请求安徽省政府与景德镇瓷业界交涉。^[43]从中可以看出，祁门瓷土市场已突破景德镇一地，销售渠道不断扩展。1930 年左右，祁门瓷土运销景德镇可获得四五十万元的收入。^[44]1936 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门派遣喻德渊到祁门调查瓷土。^[45]据同年《徽声日报》调查，祁门每年有 1 万多人依赖瓷土为生。祁门东乡瓷土最优，“专门做磁砖的水碓，共计十六家，每家有工人五十余名，或百余名不等，挑夫百余人，成本每万斤约一百三十七元，售价约一百四五十元之间。”^[46]

李训典家族还有其他人投身实业活动。李训诰第三子李家骝（1889—？），字笑凡，号致远，毕业于实业中等学堂，接受的就是实业教育。他学有所成后也积极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先后担任安徽省立第二工厂染织科主任、安徽工业学校教职员、祁门县党部工人部干事、安徽省立第二茶业试验场管理员。^[47]他长期在这些企业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对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所裨益。

三、从教地方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重视家族子弟教育。伴随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与形式的传入并普及，徽商重视教育的传统得以延续的同时也由时代注入大量新元素。阎广芬认为，“近代商人本身的受教育过程也是推动近代商人捐资教育事业的重要因素”。^[48]李训典家族在经商发家后，不断捐助子弟入学，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其中不少人学有所成之后，又积极投入新式教育事业中，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徽州教育的发展。

前文已提及，李训典的曾祖父志祥公就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这种优秀家风一直被后子孙继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李训典之侄李家骢等人在《李训典行状》中又说：“吾家自太高祖以来，世代业商，至先曾祖考，始以书课儿

辈”，^[49]即为明证。李训典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因父亲英年早逝，家中茶叶贸易需要有人继承，于是弃儒就商。虽然长期在商海闯荡，但李训典具有“富而教不可缓”的教育理念，不惜以重金延师课子。其家族中多人毕业于祁门县高等小学和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如李训典

堂兄李训诰，“光绪丙午科正贡士，候选训导”。李训典长子家驩，“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增生，南京茶务讲习所肄业，皖江法律学校修业”；次子家骥，先后毕业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第一部本科。^[50]现将李训典家族受教育和从业情况列表如下：

表1 李训典家族成员受教育和从业情况一览

名字	受教育情况	从业情况
训诰	光绪丙午科正贡士	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梅南高等小学校校长、祁门县教育会会长
家驩	清国学生，广州市民大学毕业	广东省长公署科员
家骥	清邑庠生，安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优贡本科第一类甲等毕业	祁门县县视学教育会会长、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南乡乡立小学校长，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第三中学教职员等
家骥	清国学生，安徽实业中等学堂毕业	安徽省立第二工厂染织科主任、安徽工业学校教职员、祁门县党部工部部干事、安徽省立第二茶业试验场管理员
家骥	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安徽省立体育学校毕业	祁门县立小学教员，又充梅南学校教员
家骥	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毕业	梅南高等小学校、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祁门县督学
训则	邑庠生	—
家骥	安徽陆军小学校、北京清河镇军官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	参战军第二师排长、西北军第四混成旅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师少校团副、第三十五军少校副官、第十军军官教导团中校大队长
训谟	附贡生	茶商
家骥	清国学生，紫阳师范学堂毕业	梅南高小学校教员
家骥	祁门县高等小学堂毕业	初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教员

注：“—”表示缺记载。

资料来源：《世系·风田派·起龙支》，《祁门李氏宗谱》卷四，民国刻本。

从表1可以看出，李训典家族虽是经营茶叶起家，但其家族后人大多放弃商业经营，转而投入教育事业。这和明清时期徽商发家致富后，其子弟转而进入其他非商业领域的情况颇为相似。李训典堂兄李训诰、李训则，兄长李训谟，李训典三个家族的子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细部来看又各有区别。李家骥、李家骥、李家骥等子弟还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实业中等学堂、紫阳师范学堂接受中高等教育；甚至如李家骥等少数

族人就读于军事学校，由此参军入伍，成为国民革命军军官。而且不少族人学有所成后，继续投身祁门县的基层教育事业，积极培育新式人才。例如，李训诰先后担任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梅南小学校校长、祁门县教育会会长；李家骥先后担任祁门县县视学教育会会长、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南乡乡立小学校长，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第三中学职教；李家骥先后担任梅南高等小学校、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祁门县督学等。

李训典家族这些从事基层教育事业的族人对祁门教育秩序的维护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在这种背景下，祁门各地也积极筹办新式学校。茶业经济是近代祁门的经济支柱，因此，祁门城乡各处新式学校的兴建与茶业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梅南高等小学堂就是由祁门南乡茶商康达、胡元龙、李训浩等人于1905年在平里镇创办。校舍由康达捐献的“会同康”茶号改建，经费报请县政府附征茶厘，茶叶每斤抽取2文，由茶号经收再转交学校。经过认真筹办，当年秋季招生开学，首任校长即为谢庆余，开设三个班级授课，学生60多人，生源多来自南乡各村。由于有着充足的教育经费，该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作为祁门县第一所新式学堂，梅南高等小学开启了祁门近代教育的先河。而在李训典家族中，李家骢、李家骏、李家驎学有所成后均曾任梅南高等小学校教员，李训浩还曾担任该校校长。

在李训典家族众多成员中，李家驎、李家骥、李家骧、李家骢、李家骅等人对祁门地方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李家驎(1894—?)，字轶凡，号逸舫，李训典次子。就读于当时徽州颇有名气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优异。李家驎以本科二年级时学校布置的课程作业为契机，完成《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和《动植物对于人生之关系》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该学校的校刊《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杂志》上。^[51]前者是立足于家乡祁门自然环境，在充分调查之后完成的调查报告。该文分山脉、河流、交通、人民职业与生计、实业等内容，对祁门县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风俗习惯等进行全景式的展现，显示出李家驎浓郁的乡土地理观念。后者则是对动植物与人生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考察，体现出朴素的动植物观念和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

1921年6月7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向徽属六县知事发布通知，主张利用暑假时间开设

暑假讲习会，“以推行国语，增进小学教员学识，兼便学生补习为宗旨”，分为国语、教育、英文、数学、补习等课程，每个学员任选一科学习，学时为四个星期。该讲习活动面向徽州六县的小学教员、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活动不收学费，仅收伙食费2元和灯油茶水等杂费1元。^[52]李训典家族的李家骧、李家驎等参加这次培训活动。这次讲习会对于提高包括祁门在内的徽州县域教师教育水平具有很大的作用。

李家骧(1882—1928)，字锡番，号铁舫，又号仞千，别号凤山太郎，为李训浩长子、李训典堂侄。自幼业儒，为国学生，后毕业于广州市民大学，曾供职于广东省长公署科员。他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撰写有《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53]该书采用新式章节体，分疆域、山脉、河流、交通、险要、田赋、物产、人物和古迹九章内容，对祁门自然地理环境和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教育文化、地理交通等进行考察，是清末以来乡土地理研究热潮的延续，带有鲜明的近代化特征。^[54]李家骧尤为关注祁门各乡的学校教育情况。关于梅南高等小学堂，他说，“吾邑以此学堂开办为最早，成迹以较优，头班生已于去年卒業矣”。^[55]对于东乡各地学校，他亦云“鳧溪口等地有初等小学堂数所”。^[56]李家骧第四子李修柏(1909—1968)，字希狄，又名李可福、李可夫、李式一，1930年考入安庆圣保罗中学，后转入南京东方中学。1934年5月在江西浮梁程家上参加工农红军，投身革命事业，后任梅南小学教员。1937年重回革命队伍，被派回祁门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中共祁门支部，先后担任皖南特委组织员、泾县区委书记、华东局民政部科长。解放后，历任皖南革命干校第四部主任、中国茶叶公司皖南分公司副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处长、最高人民法院华南分院司法行政处处长、中央政法干校刑法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法律系副主任和主任。^[57]

李家骧(1884—1930)，字蛰凡，号竹舫，为李

训诰次子。1908年,被藩署裁革的书吏戴起洪等人阻扰茶捐征收,并勾结王基大、胡文伟到梅南小学堂滋事,造成学校停课,学生被遣散回家。但祁门赵知县不仅不认真处理此事,而且还推波助澜,由此激起南乡士绅和学生不满,他们要求将此事禀呈安徽提学公署。^[58]胡文伟、戴起洪等人还自充南乡梅南小学堂长,“擅立章程,私派正账”,破坏学校学务。当时身为祁门县学生的李家骧和该校堂长谢庆余一起禀呈安徽提学官,请求严惩胡文伟等人的非法行为,获得批准。^[59]李家骧的行为有力地维护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保证了茶捐正常征收,保障了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促进了梅南小学堂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1909年,祁门县官绅公举胡耀华为该校堂长,兼任国文、历史教员。他聘任一些很有学识的人员来任教,如留学日本师范学校的胡维周教授生物、物理、化学、算术,促进学校“形式精神均有进步”。^[60]1910年,开办五年的梅南高等小学堂迎来首届的甲班学生毕业。^[61]当时知县孔令庆、劝学总董谢庆余一同会考,并举行毕业典礼。梅南小学堂的这些发展与李家骧等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1919年,安徽省教育部门委任李家骧为祁门县视学,负责督查祁门县教育事业。^[62]他先后担任祁门县县视学教育会会长、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南乡乡立小学校长,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第三中学职教员。1930年担任南乡乡立小学校长时,该校有教员6人,学生82人,常年教育经费2000元。^[63]李家骧长期在祁门担任教育官员和教员,对祁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64]

李家骧(1898—?),字醒凡,号星防,为李训诰第五子。他先后就读于祁门县立高等小学堂、安徽省立第三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学有所成后,他全身心投入祁门县的教育事业,先后在梅南高等小学校和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造福桑梓。1928年春,他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第三师委充师部参谋处中尉办事员,随军北伐,参与鱼台、济宁、

黄巢寨、济南诸役”,当年7月他奉命退伍。^[65]复原回乡之后,他继续投身祁门县的教育事业。1930年,祁门县督学胡凌云改任县立小学校长,教育局长郑文、县长谭声丙向安徽省教育厅保荐李家骧担任县督学。安徽省教育厅十分认可李家骧的教育能力,“查该员在省立第三中学校毕业,曾任该县县立小学教员四年以上,学识经验亦尚丰富,核与县督学暂行规程所定资格相符。本厅即予委任,除将委状发由该县长转给具领外,仍仰随时督飭,认真视察,以重职责”,^[66]正式委任其为祁门县督学,并要求李家骧认真履行视察祁门教育的职责。1930年,安徽省督学周元吉视察祁门教育状况,对该县教育局工作颇为满意,并称赞“县督学李家骧,任事亦颇都称职”,^[67]肯定李家骧的督学管理工作。1931年12月,督学王德玺视察祁门地方教育时也说,“县督学李家骧,亦堪任事”。^[68]由此可见,李家骧督学工作得到了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员的认可。

李家骧(1889—?),字啸风,李训诰胞弟李训则次子。自幼习武,先后就读于安徽陆军小学校、北京清河镇军官第一预备学校,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校军衔。北伐中先后担任参战军第二师排长、西北军第四混成旅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师少校团副、第三十五军少校副官、第十军军官教导团中校大队长等职。^[69]北伐结束之后,返乡投入教育事业。1929年,督学叶明辉视察祁门县教育状况时,李家骧任祁门县立小学校长。当时该校常年经费2200元,有四个班级学生,在校学生98人,教员7人。叶氏视察该校之后,对李家骧赞赏有加,称他“任事勤恳而切实”,对他治校的校务颇为满意,“校务取分担主义,计分教务,训育,文书,揭示,成绩,书报,园艺,卫生,事务,体育十部,每部设主任一人,均由教师兼任,会议亦能按时举行,各种设备据云尚足敷用。”^[70]1930年,督学吴亮夫视察祁门县教育情况时,也注意到该校教育有所发展。当时学校有学生110人,教学分六级四班。他对学校的印象是“校长李家骧,办

事切实。教职员亦能尽职。各种会议，均能按期举行。”^[71]可见，李家骅虽为行伍出身，但治校有方，有力地促进了祁门县立小学教育发展。

四、结 语

在近代转型时期，徽州茶商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紧跟世界茶叶市场走势，创立“黄山毛峰”“祁门红茶”两个新的品牌，通过参加各地博览会等新形式推广优质产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茶商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推动近代徽商群体发展转型的核心力量。

自明清至近代以来，家族性经营始终为徽州茶商经营管理的重要模式之一。因此，家族史视角为考察近代徽商尤其是徽州茶商可行且重要的切入点。以往关于近代徽州茶商家族史的研究在资料、方法和视角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未能将商业经营传统与诸多近代新变化有机结合起来考察。本文对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的发展进行个案考察，对于深入认识近代徽州茶商的文化自觉、实业救国理念和投身基层教育实践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与明清徽商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近代徽商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主导的近代化浪潮刺激下，近代徽商也积极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等引入徽州，促使穷乡僻壤的徽州在商业、教育等方面也积极融入近代化进程。李训典家族以经商起家，并传承数代，但从李训典子侄辈开始，大多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且多不再经商，而是投身实业和祁门地方基层教育事业。^[72]李训典家族的发展轨迹并非特例。例如，绩溪茶商汪裕泰家族、茶商胡适家族，歙县茶商昌溪吴氏家族等都较为典型，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正是由于徽商崇文重教之风绵延不绝，而后续徽商子弟又不断投入地方基层教育事业，形成经济与教育两者的良性循环，有力地推动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徽州茶商家族的这种文化自觉是徽商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超越，更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思潮不断

涌现的近代社会剧变背景下，徽商以自身方式所展现的浓厚爱国情怀与时代担当。

注释：

[1]武埭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年；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梁仁志：《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黄茜：《近代徽州茶商研究》，安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张小坡：《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及劳资关系处理》，《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等等。

[3]20世纪30年代，景石李氏与界田派四房合修《祁门李氏宗谱》。笔者前几年去该村考察时，得见该族谱中有关徽州茶商李训典家族五六代人的世系资料，为了解其家族世系传承、商业活动和教育活动等提供重要线索。

[4][5][6][7][9][11][18][47][50][65][69]《世系·凤田派·起龙支》，《祁门李氏宗谱》卷四，民国刻本，第33、33-34、50、41-42、42、42、41-42、35、42、37、38-39页。

[8][10][14][16][17][21][26][28][30][49]《李训典行状》1册，民国写本。

[12]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祁门之茶业》，上海：中国纺织印务有限公司，1933年，第1页。

[13]洪素野：《皖南旅行记》，上海：中国旅行社，1944年，第143页。

[15]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语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光绪二年刻本。

[19]鲍永安主编、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页。

[20][22]《南洋劝业会审查得奖名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71页，北京图书馆藏。

[23]关于该博览会的具体研究，可参阅吴伟：《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4]《安徽巡按使批祁门县详据茶商代表李旭寅请借轮船减费执照文》，《安徽筹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报告书》，1914年。

[25]《安徽巡按使署飭准农商部咨复李旭寅请拨款组织中国茶行一案转行知照文》，《安徽筹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报告书》，1914年。

[27]陈琪：《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1916年，国家图书馆藏。

- [29]《安徽省长公署训令第313号》,《安徽实业杂志》1925年第6卷第2号。
- [31]《祁门设立实业教育研究社》,《安徽实业杂志》1919年续刊第26期。
- [32]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 [33][清]刘汝驥:《批判·户科·祁门县孔令庆尧申送物产表批》,《陶甓公牒》卷三,《官箴书集成》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563页。
- [34]《研究安徽祁门县东乡村龙凤壁、大北港三处磁土原料成色单三项》,《华商联合报》1910年第3-4期;侯德封:《祁门县之陶土》,《中国矿业纪要》1929年地质专报丙种3,第124页。
- [35]《舆地志·风俗》,同治《祁门县志》卷五,同治十三年刻本。
- [36]郑志锡:《民族实业家康达》,《祁门文史》第1辑,徽州新华印刷厂,1985年,第4页;景德镇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景德镇徽帮》(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1993年。
- [37]《令委调查祁门县瓷土公司各情形由》,《安徽实业杂志》1913年第4期。
- [38][39]李家驥:《创办祁门瓷业意见书》,《安徽实业杂志》1918年续刊第16期。
- [40]《批高等学校毕业生李家驥拟创办安徽瓷业公司由》,《安徽实业杂志》1919年续刊第21期。以下谈论李家驥创建祁门瓷业公司章程的内容所用资料均出自该文,不再逐一标注,特此说明。
- [41]《安徽省站公署指令第三千三百七十六号:令祁门县知事呈一件呈送瓷土出产数目及销售价值比较表祈核示遵由》,《安徽公报》1922年第1112期。
- [42]《安徽省长公署批令第七百零九号:电恳严禁祁门磁土外运以维磁业由》,《安徽公报》1922年第1143期。
- [43]《祁门白土外运与景德镇瓷业无妨上安徽省长请弛禁电》,《上海总商会月报》1923年第3卷第11期;《祁门白土请准益中外运事致江西瓷业公司缄》,《上海总商会月报》1923年第3卷第6期。
- [44][67]周元吉:《视察祁门县教育报告》,《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4卷第19期。
- [45]《中央研究院派员来皖调查皖南地质及祁门磁土》,《学风》1936年第6卷第3期。
- [46]《祁门县磁土调查》,《皖事江报》1936年第6期。
- [48]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活动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 [51]李家驥:《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杂志》1917年第4期;李家驥:《动植物对于人生之关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杂志》1917年第4期。
- [52]《令为呈报暑假期内开办讲习会并送简章请飭本学区

县分选送学员由》,《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第42期。

- [53]李家驥:《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1918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 [54]关于近代徽州乡土志的专门考察,可参阅刘猛:《近代徽州乡土志研究》,王振忠、邹怡主编:《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第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292-310页。
- [55][56]李家驥:《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第3,2页。
- [57]李修柏事迹,笔者于2023年5月16日,在祁门县景石村考察时,在该村中历史名人展示墙壁察看所得。笔者选取一部分内容,稍加整理而成。
- [58]《革命胥阻扰学务》,《安徽白话报》1908年第1期。
- [59]《又批祁门县学生李家驥等禀挟私闹学破坏定章恩惠激究文》,《安徽官报》1908年第24期。
- [60]《小学翘楚》,《安徽白话报》1909年第2期。
- [61]《祁门高等小学堂毕业》,《教育杂志》1910年第4期。
- [62]《委任李家驥为祁门县县视学此令》,《安徽教育月刊》1919年第15期。
- [63]《祁门县全县公私立学校概况表》,《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年第11期。
- [64]除了担任教职外,李家驥还在安徽、江西各级政府任职,即督办安徽赈抚事宜处抚务科教养干事、安徽财政厅总务科登记科员、征榷科厘税科员、江西财政厅科员、实业厅咨询、安徽政务委员会秘书处员、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科员,对安徽和江西财政税收管理和经济秩序的维系产生积极作用。(《世系·凤田派·起龙支》,《祁门李氏宗谱》卷四,民国刻本,第34-35页。)
- [66]《祁门县督学暨桐城县立中学校长之委任》,《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年第3卷第31期。
- [68]王德玺:《视察祁门县地方教育报告》,《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2年第5卷第14期。
- [70]叶明辉:《视察祁门县教育报告》,《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年第3卷第8期。
- [71]吴亮夫:《祁门县教育视察报告书》,《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年第3卷第50期。
- [72]这种优良的家风传承一直延续至今。2023年5月16日,笔者在该村考察采访李训诰曾孙女李艳琴(1944年生,李家驥第四子李修植之女),她说其伯父李修植之子李国生(1957年出生于安徽省祁门县,自幼过继给舅母家赵氏为子,故改名为赵新生)为北京大学教授,每年还回来扫墓。笔者查阅百度百科和北京大学官网得知,赵新生的信息和她说的完全相符。赵新生物本科、硕士皆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博士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物理化学。

〔责任编辑:陶婷婷〕